

讲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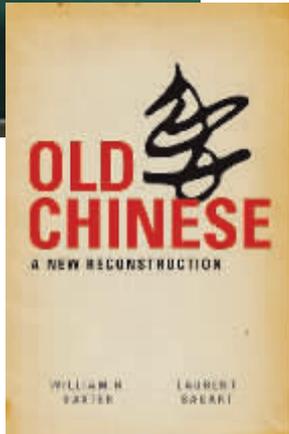
← (上接3版)

是,复杂辅音还可以作为复辅音的组成成分,我在此基础上提出  $C_1C_2- > C_1'- > C_1C_2'- > C_1'-$  的音变模式,并以此说明郑张尚芳的“丙”拟音(\*p-krak > prang)与“柔”拟音(\*mlju)比白-沙拟音更能解释“丙”“更”的谐声与“柔”“矛”的谐声。此外,从古文材料看,郭店《老子甲》简33中的“骨弱筋柔”之“柔”写作“𠂔”,我认为“求”就是声符(\*g'u),“矛”(mu)为前置辅音,而“柔”的上古音则是 \*mg'lu > m'lu > MC n'u; 同时,粤语中表示猴子的“马流”(malau < m·lu < m·glu)来自以“柔”为声符的“猻”(mg'lu > m'lu > nu > n'au > nau)也能够支持这种构拟的观点。

第二是关于三等与非三等的来源问题。蒲立本最早提出三等字的-i-介音后起,那么其原始形式是什么?郑张尚芳、斯塔罗斯金都认为三等来自短元音、非三等来自长元音;罗杰瑞、白一平认为三等带常态声母,非三等带咽化声母;我的观点更趋综合,认为三等来自松的常态元音,非三等来自紧的咽化元音,松元音通常是短的,紧元音通常是长的(详见潘悟云《对三等来源的再认识》,《中国语文》2014年第6期)。从个例看,“乌、狐、蛙”等动物叫声拟声字、“唉、鸣、哇”等人声拟声字,绝大部分都来自非三等的咽化元音。

第三是塞擦音后起的观点。首先,世界上其他较古老的语言中都没有塞擦音,从个体发生学的角度,塞擦音一定为后起。中古声母中,端、知、章三组声母近音。白-沙体系中,知母都拟作 tr-, 章母都拟作 t-, 其中知母拟作 tr-能够解释其后来发展为卷舌音,但其不能证明上古也一定包含能够反映卷舌特征的成分,同时会为其上古音构拟带来麻烦。我认为存在三等字 t->tj->t'->tç->tʂ-的音变链。其中,上古知母与端母均为 t-, 端母一四等、知母二三等;上古章母 tj-是 t-的腭化音;中古知母 t'-、章母 tç-与上古同样存在先后关系;后来都变为卷舌音。但这一音变链无法解释二等字的音变现象。我认为,许多二等字可能本来并不是二等字,从词汇本身容易发现的例子如茶(澄母二等)来自茶(定母一等)、怕(滂母二等)来自怖(滂母一等)、爬(並母二等)来自匍(並母一等)。

第四是鼻音流音、擦音的



白一平(左上)、沙加尔(右上)的著作《上古汉语新构拟》(牛津大学出版社,2014)获得2016年美国语言学界颇为重要的布龙菲尔德图书奖(The Leonard Bloomfield Book Award)

三分格局(清不送气、清送气、浊)。到目前为止,从董同龢、李方桂到白一平、沙加尔都是二分的(清、浊);但从谐声看,应为三分,如“撫(>滂母)、撫(>晓母)、無(>明母)”谐声、“絮(>彻母,即透母)、恕(>书母)、女(>娘母)”谐声、“澳(>透母)、啜(>晓母)、夷(>以母)”谐声等,这些处于同一谐声系列的字到中古分别成为清塞擦音(塞音)、擦音、鼻音,因此这些谐声系列的三分格局是不能否认的。但这样的三分格局似乎难以解释同一中古清音有两个上古来源(不送气、送气)的问题。我认为,这可能是非线性音变的结果,如 m-可能来源于 sm-或 hm-。但必须承认这只是一种假设,其解释力需要更多证据来检验,如一些苗瑶语中还存在 hm-、h-、m-的三分格局。

由此,关于精组来源问题,我认为,章组早期并非塞擦音(tj-),精组早期也非塞擦音。白-沙体系中使用了塞擦音(ts-、tʂ-、dz-、s-),我对这种构拟并不认同,因为现在许多民族语(如壮语)中依然没有塞擦音,并且其他较古老的语言基本没有塞擦音。但如果取消塞擦音,会给构拟带来很大的麻烦。对于精组的来源,\*sk-、\*sp-、\*st->ts-(精母)已经是许多语言学家普遍认同的观点,但这只能解释一部分字。郑张尚芳在《上古音系》中提出 s->ts-(精母)、sʰ->tʂ-(清母)、z->dz-(从母)的音变规则,这能够从苗瑶语、缅甸语等语言中得到证据;我自己的看

法是,精母字就是 s-, 心母字的 s-则是 sCl->sl->s-音变链的结果。

第五是影、晓、匣(云)母的小舌音拟音,影>\*q-、晓>\*qh-、匣(云)>\*G-,其中非三等和虚词有 \*ʔ-、\*h-、\*fi-变体,这是由于潘悟云体系中非三等字包含咽化元音,会促使小舌音声母后移而成为喉音。在此体系下,叹词“呜呼”的拟音为 \*ʔaha,语气词“兮”的拟音为 \*fie,以及描写动物叫声的乌 \*ʔa、蛙 \*ʔe、狐 \*fi'a,拟音音值与它们的实际功能更为相符。另一方面,我也认同白一平的观点,认为小舌音 G 能够经由 \*G->fi->j-音变链成为以母;我的一个补充是,提出 \*G'-, G'->fi-(匣母,一二四等),fi-(云母)的音变链以及 cl->fil->l->j-音变链,如“摇”拟作 \*claw,能够从武鸣壮语音 klau 的事实获得支持。

第六是关于使动态的问题。白-沙体系认为,表示“打败”的“败”(p-, 帮母)与表示“失败”的“败”(b-, 並母)是及物与不及物的对立,前者无标记(\*prads)而后者有标记(\*Nprads, N为鼻音前缀),这跟英语一样,defeat 无标记而 defeated 有标记。但我认为,根据汉语的语感,表示“失败”的语义是自动的,而表示“打败”的语义是使动的,“败”从语义对应上更接近于英语的 collapse,因此应该是帮母的“败”有标记而並母的“败”无标记。在潘悟云拟音体系中,使失败的败带有 s-标记(藏语动词仍用 s-前缀表示使动),后来 s-前缀使浊音 b-清化为 p-。

分化,造成“转注”。同音指的是词根,不含词缀;而同源就是同根。因此,在古音研究上,与谐声相比,转注与词根的关系更为紧密。

许多转注都是“假形声、真转注”。许慎释“考老转注”时又说“老”是会意、“考”是形声,明示形声字包括转注。例如,“哭”qhoog 与藏文 q'u、缅文 qou、浪速话 quk 同源,如果没有《说文》“哭,从吅狱省声”的记载,就难以确定哭是鼻音声母。又如,“手”、“首”二字中古同音,高本汉、王力的上古拟音都是同音的书母幽部三等上声字,但在“头”字流行之前,不太可能用一对同音字指称不同的身体部位。“手”的谐声字“扌”又作“扌”,而“丑”是透母幽部三等上声字,两字声母正合 nh-与 hn-的转注关系,因此可以认为“丑”是“手”的改体转注字。如此,将“首”拟作 hl-、“手”拟作 hn-, 两字的读音形成对立。另外,前缀冠音也能反应于转注字,如 s-可表示名物化,后缀附尾-s(中古变去声)表外向动词。

这些例子都表明,上古汉语在文字层面上也能够包含语法意义,而对于这些转注字的研究,有利于更好地了解上古汉语的面貌。

研究古音一般利用韵部、谐声等材料,但转注材料也应被重视

郑张尚芳(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):我来对潘教授的发言做些补充。郑张尚芳、潘悟云体系在长短元音对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松紧元音的对立,这些都是重要的基础理论假设。而从一些南亚语的证据看,松紧元音与长短元音之间的联系能够被建立,如佉语中松元音对应短元音,紧元音对应长元音。然而,白-沙体系采用的“咽化说”观点无法解释“车”字两读,一在麻三,一在鱼韵的-i-介音问题,白-沙体系拟音两读均无介音,而郑张尚芳体系区分了长短元音,短韵不加介音,从而解决了此问题。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郑张尚芳体系之于白-沙体系的优越性。

接下来,我想谈谈转注对于古音研究的作用。研究古音一般利用韵部、谐声等材料,但转注材料也应被重视。转注意味着同根字的分化。语言中音义相关的词,可分为“异源共形词”与“同源异形词”两类。前者本质是古同音词,反映到文字便是“假借”,或加形旁再加区别造成“形声”;后者本质是“词形体现区别”的古异读词,反映到文字上就本字再加以改造

讨论

如何梳理好现有材料的时间层次

冯蒸(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):白一平、沙加尔《上古汉语新构拟》的出版,对中国上古音研究者既是激励,也是挑战。《上古汉语新构拟》在材料运用上,运用了闽方言和古文字的材料;在构拟体系上,接受了罗杰瑞的“咽化说”。郑张尚芳最早将音节分为一二四等与三等两类,对这两类音节对立的构拟,不同学者分别进行了各自的探讨,结论不尽相同,因此还需要古文字的事实来证明这些假设。

郑伟(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):对于喻四的构拟问题,白-沙体系中有 \*l-与 \*ql-两